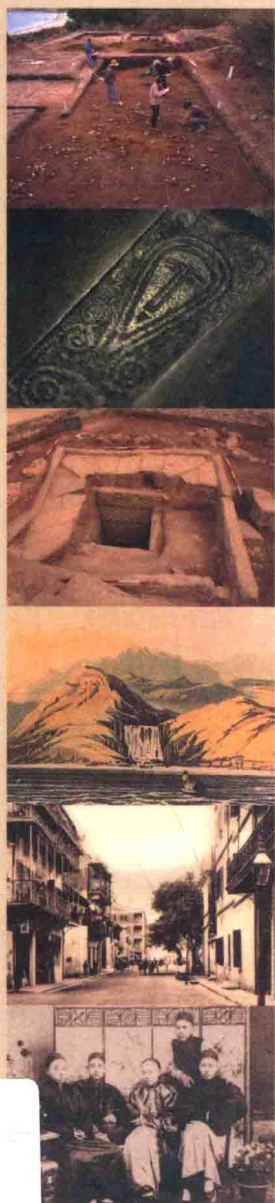


香港文化 發展史

王國華 主編

鄧聰 等著
蕭國健

中華書局



香港文化 發展史

王國華 主編

鄧聰 等著
蕭國健

中華書局

□ 印 務：劉漢舉
□ 排 版：時 潔
□ 裝 幀 設 計：高 林
□ 責 任 編 輯：黎耀強

香港文化發展史

□

主編

王國華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
電話：(852) 2137 2338 傳真：(852) 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hwa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觀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A 室

□

版次

2014 年 7 月初版

© 2014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規格

特 16 開 (230 mm × 170 mm)

□

ISBN：978-988-8290-93-2

本書中文繁體字版由中華書局（北京）有限公司授權出版，
原名《中國地域文化通覽（香港卷）》，本書為其上編。

出版說明

《香港文化發展史》原為中華書局（北京）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國地域文化通覽·香港卷》的上編。

《中國地域文化通覽》共分為三十四卷，是國家重點文化工程，由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袁行霈及國務院參事室主任陳進玉主編，國務院參事室原副主任陳鶴良和十二位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任副主編。《通覽》是中國第一部按照行政區劃梳理地域文化的大型叢書。在大量可信資料的基礎上，《通覽》各分卷縱向闡述本地文化發展的歷史脈絡，橫向展示各地獨具魅力的文化特色和亮點，可視為系統、準確地了解中國地域文化底蘊的讀物。《通覽》經過六年的籌備，由 2012 年開始陸續出版。

為籌備《中國地域文化通覽·香港卷》的出版，特別為此組成了組織工作委員會和編撰工作委員會（詳細名單見下），制定了集體創作、集思廣益的原則，既要有學術性、權威性，也要有可讀性。為此，組委和編委遍訪全港近五十位教授、專家、學者，聆聽意見，最後邀請了三十位專家學者參與撰寫，從編訂目錄大綱、分工撰述到編製時間表，都是在廣泛徵詢意見後擬訂出來的。組委會和編委會尊重學者的學術觀點，提倡論從史出，並盡可能通過討論交流，多番修改，精益求精。經過三年的時間，終於完成了這本近六十萬字的鉅著，於 2013 年 9 月在內地出版。

《中國地域文化通覽·香港卷》的中文繁體字版，是按原來一冊中上下兩編的框架，分拆為《香港文化發展史》及《香港文化導論》兩冊出版。希望這兩本書的出版，有助讀者從中國地域文化的角度，對香港文化的歷史發展和特色，有更深入的了解。

《中國地域文化通覽·香港卷》組委會、編委會

組織工作委員會

主任：王國華

副主任：楊祖坤 陳新滋 高佩璇 鄧立光

委員：杜辰 馬文通 陳致 鄭立恆（以姓氏筆畫為序）

編撰工作委員會

名譽主編：饒宗頤

顧問：梁愛詩 王鳳超 何志平 高佩璇

主編：王國華

執行副主編：楊祖坤 李焯芬

副主編：陳萬雄 李曰軍 鄧立光

編委：杜辰 馬文通 鄭立恆 鄧偉雄（以姓氏筆畫為序）

編撰辦公室

主任：楊祖坤（兼）

成員：杜辰 馬文通 程箭雲 鄭立恆（以姓氏筆畫為序）

編者及作者簡介

王國華，現任國務院參事。祖籍中國山東，曾從事教育、新聞、出版工作。1992年至2008年任香港大公報社長、董事長。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曾主持編纂大型文化叢書《孔子文化大全》，主編《中華魂》叢書、《縣級決策的理論與實踐》叢書，以及《書法六問》、《書法四字經》等著作。

楊祖坤，1940年出生於香港，肄業於廣東師範學院中文系。1959年加入香港《大公報》，由當記者直至擔任總編輯，工作四十餘年後退休。現任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理事長。早年著作包括小說、散文，後研究香港經濟，有多部與香港股票市場有關的著作結集成書，筆名林浩雨、沈金、楊曉風等。

王鳳超，新聞學碩士。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副所長、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第十一屆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主要著作有《中國的報刊》、《延安解放日報史》（合著）、《「一國兩制」的理論與實踐》（合著）、《香港政制發展歷程》等。

何佩然，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致力從事社會及經濟史研究。曾出任巴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研究顧問，出版多種有關香港及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專書，近年專注近代香港都市化問題。何教授也是法國棕櫚教育騎士、香港中文大學梁保全香港歷史及人文研究中心主任、逸夫書院李和聲香港歷史資源中心主任及逸夫書院校董會成員；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理事會成員；古物諮詢委員會成員；勞工及福利局香港太平洋戰爭紀念撫恤金顧問委員會主席；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博物館專家顧問、歷史博物館諮詢委員會成員，以及法國巴黎索

邦大學杜蓬客座教授。

鄧聰，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德國考古研究院通訊院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主任、歷史系教授。專攻東亞考古學。曾在法國、日本、越南、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參加或主持考古工作。在國內外曾出版十幾本考古學專著，學術論文百餘篇。

蕭國健，現任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歷史研究所暨中國文學系教授、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及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香港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名譽研究員，香港皇家亞洲學會名譽研究員，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專家顧問（本地史／軍事史），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古物古蹟、及非物質文化評審委員會委員，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海防博物館、深圳市歷史博物館、深圳市中英街歷史博物館名譽顧問。著有《香港歷史研究》、《香港古代史》、《香港新界家族發展》、《香港之海防歷史與軍事遺蹟》、《粵港中西古炮》及《災患與香港史》等二十餘書，以及中英論文六十餘篇。

羅婉嫻，現為香港浸會大學講師，教授香港歷史的科目，並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等發表學術論文。

目 錄

出版說明	i
------	---

編者及作者簡介	vii
---------	-----

緒 論	王國華
-----	-----

第一節 香港地域文化的形成與嬗變	2
------------------	---

第二節 香港文化的主要特徵	8
---------------	---

第三節 香港文化的地位與影響	12
----------------	----

第四節 書寫香港文化的新篇章	14
----------------	----

第一章 香港史前文化探尋	鄧 聰
--------------	-----

第一節 尋找最古老的香港文化	27
----------------	----

第二節 長江彩陶和白陶的流入	33
----------------	----

第三節 樹皮布文化源流的探索	42
----------------	----

第四節 良渚文化玉器向南分支	53
----------------	----

第五節 從以船為家到聚落定居	57
----------------	----

第二章 青銅時代的香港文化	鄧 聰
---------------	-----

第一節 商代玉禮器牙璋在香港	69
----------------	----

第二節	沿海環玦飾物作坊興盛	78
第三節	人面弓形格銅劍文化圈	97

第三章 秦漢至明清時期的香港文化 鄧 聰

第一節	秦漢時期	108
第二節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	123
第三節	隋唐－宋元時期	128
第四節	明清時期	147

第四章 近代以來香港歷史文化的演變 蕭國健

第一節	清代以來香港新界之管治	158
第二節	清代移民與人口流變	162
第三節	鴉片戰爭、《南京條約》、《北京條約》 與新界之租借	167
第四節	新界之佔領與居民之抗英鬥爭	171
第五節	從九龍寨城到九龍寨城公園	173

第五章 英佔早期中西文化的激蕩 羅婉嫻、何佩然

第一節	香港管治架構的建立	180
-----	-----------	-----

第二節	維多利亞城的規劃	189
第三節	經濟活動	198
第四節	社會風貌	208
第五節	教育事業	219
第六節	宗教信仰	230

第六章 香港與辛亥革命：

孫中山革命思想的香港實踐與香港文化

王鳳超

第一節	孫中山革命思想的搖籃	242
第二節	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平台	251
第三節	革命派的思想前哨	276

緒 論

王
國
華

香港，地處中國東南邊陲，位居東亞中心地帶，臨珠江，面南海，交通便利，道達五洲，是國際航運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由香港島、九龍半島、新界及 262 個離島組成，土地總面積約 1104 平方公里，¹ 總人口約 707 萬。²

數千年來，一代一代香港人傳承嶺南文化，吸收中原文化，融合西方文化，在香港逐漸形成相容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地域文化。香港文化與中華文化不可分割，是中華文化「多元一體」³ 格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一節

香港地域文化的形成與嬗變

中華文化 西方文化 鴉片戰爭 中西文化的碰撞與融合

香港自古便是內地移民開發者的聚居之地，綜觀香港文化的發展歷程，

1. 由於填海工程，香港土地面積處於不斷變化之中，截至 2010 年，香港土地總面積為 1104.39 平方公里。
2. 香港統計處 2012 年 2 月公佈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結果，截至 2011 年 6 月底，香港總人口達 707 萬人，較十年前增加 36 萬。
3. 1989 年，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學作題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學術講演，標誌着一個新的民族理論體系的誕生。文章主要闡述三大觀點：第一，中華民族是包括中國境內五十六個民族的民族實體，並不是把五十六個民族加在一起的總稱。五十六個民族已結合成相互依存的統一而不能分割的整體，在這個民族實體裏所有歸屬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層次的民族認同意識，即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的感情和道義。多元一體格局中，五十六個民族是基層，中華民族是高層；第二，形成多元一體格局有一個從分散的多元結合成一體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必須有一個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漢族就是多元基層中的一元，由於它發揮凝聚作用把多元結合成一體，這一體不再是漢族而成了中華民族，一個高層次認同的民族；第三，高層次的認同並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層次的認同。不同層次可以並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層次的認同基礎上可以各自發展原有的特點，形成多語言、多文化的整體。高層次的民族可以說實質上是既一體又多元的複合體，其間存在着相對立的內部矛盾，是差異的一致，通過消長變化以適應於多變不息的內外條件，從而獲得共同體的生存和發展。

其形成與發展，始終與中華文化一脈相承，與華夏文明的興衰息息相關。一部香港文化發展史，既是香港與內地以移民為載體、在人文層面的互動歷史，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

早在七千年前，香港地區已有人類繁衍生息。從新石器時代中期，南中國先民已陸續遷徙至香港地區，從事漁獵採集等活動，揭開香港歷史的序幕。作為香港最早的定居者，其文化與湖南大溪文化、湯家崗文化有着密切的關係。新石器時代晚期，五嶺南北的先民又大量遷入香港地區。在距今六七千年間，環珠江口一帶已形成以水路為幹線的共同文化網絡，稱為大灣文化，反映了與沿岸海洋生態相適應的一種原始社會形態。近年從湖南高廟、深圳鹹頭嶺和香港深灣等遺址，相繼出土鳳鳥紋飾陶器，說明環珠江口獨特的鳳鳥文化體系，與長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有着密切關係。

距今四五千年前，香港地區經常發生氏族戰爭，並且受到長江良渚文化的影響。青銅時代早期，嶺南地區的浮濱文化等對香港地區產生影響。青銅時代中期，隨着代表中原商代的青銅時代文化如牙璋、戈、玦、環等器物的傳入，中原文化登陸香港地區。至公元前一千年前，香港屬於古越文化範疇。

從秦漢到明清，香港經歷兩次行政大開發、兩次移民大遷徙和兩次商貿大發展，在政治、軍事、經濟、社會與文化等領域，與內地密切相連。以中華文化為根基的香港文化，在嶺南文化系統內，匯集南北文化，融合不同地域文化，不斷吸取中華文化母體的養分，體現華夏文明的傳承延續。

秦漢時期，香港經歷兩次行政大開發。秦始皇戍邊開發嶺南，漢武帝於番禺設置鹽官，對香港發展產生深遠影響。自秦朝始，香港地區正式納入中央政權版圖。秦始皇平定百越、統一中國後，於南方建立桂林、象、南海三郡，香港隸屬南海郡番禺縣。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⁴這是香港發展的重大事

4. 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版。

件，從此漢文化對越文化產生極大影響。漢武帝（前 156—前 87）在番禺設置鹽官，統籌食鹽的生產與銷售，香港是當時主要鹽場之一。1955 年發現的九龍李鄭屋漢墓為東漢古墓，墓磚有「大吉番禺」、「番禺大治曆」等文字，其陪葬器物形制與墓室結構，常見於華南東漢墓，反映中原文化對香港居民生活方式的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和宋元時期，香港經歷兩次移民大遷徙。當時北方戰亂頻繁，中原人士為逃避戰禍，舉族、舉家南遷，令中原文明向南播遷，促進了香港地區的發展。東晉義熙元年（405），盧循領導的浙東起義軍敗部退守大嶼山一帶，為香港地區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移民活動。南朝劉宋奇僧杯渡禪師於屯門講經，成為佛教在本地區傳播的佐證。今香港之圍頭人、客家人，據稱多是宋元時期由江西、福建等地遷來。南宋末年，宋幼帝避難香港，建立宋朝最後的帝都，留下了宋王臺、侯王廟等遺跡。

隋唐時期和明清時期，香港經歷兩次商貿大發展。當時海上貿易發達，香港地位日益重要，既是江海交通樞紐，也是邊防要塞，屯門是海船進出廣州的必經之地。開元二十四年（736），唐朝於屯門設置軍鎮，而「屯門」亦成為最早見於中國古籍的香港地名。途經屯門的商旅絡繹不絕，令屯門聲名遠播，文人墨客寫就不少吟唱酬詠屯門的詩歌。韓愈在《贈別元十八協律》中描繪「屯門雖雲高，亦映波濤沒」，劉禹錫在《踏浪歌》中讚歎「屯門積日無回飆，滄波不歸成踏潮」。現時香港地名自明朝大量見於史籍。九龍的名稱，最早見於明朝應慎所著《蒼梧總督軍門志》。香港島的名稱，則最早見於明朝郭棐所著《粵大記》。在該書所附《廣東沿海圖》中，標有香港、赤柱、黃泥涌、尖沙咀等地名。

香港雖是彈丸之地，但憑藉地理環境優勢，自古以來不僅是漁村漁港，也是中國重要的鹽業生產基地和江海交通運輸樞紐。鴉片戰爭前夕，香港地區已有許多村落或定居點，主要包括石排灣、黃泥涌、柴灣、田灣、灣仔、石澳、薄扶林等，一些村落已具相當規模，如石排灣約有房屋二百幢。根據

1841 年參與佔領的英國官員莊士敦憶述：「赤柱村是全島最大及最重要的村落……共有房屋及商鋪一百八十間……居民從事農耕、商業及醃曬鹹魚，約有農田六十畝……常有為數三百五十多艘大小船艇在此停泊。」⁵ 大量歷史文獻證明，所謂「開埠」前的香港，不是「一座荒島」，⁶ 亦不僅僅是「一條漁村」，⁷ 香港歷史的實際開端絕非始自鴉片戰爭後的「開埠」，⁸ 它的根早在七千年前已經孕育成長。

鴉片戰爭是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開端。自鴉片戰爭始，香港文化在傳承中華文化的基石上，遭遇空前的中西文化碰撞。香港既捍衛中華文化，又融合西方文化，成就了海納百川的香港文化。

鴉片戰爭後，英國經由割佔香港島、九龍半島，強行租借新界，對香港實行殖民統治，推行權力集中、控制嚴密的直接管治制度。1841 年 2 月 1 日，在佔領香港島的六天後，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便發表文告安民：「一切禮教儀式、風俗習慣及私有合法財產權益，概准仍舊自由享用，官吏執政治民，概依中國法律風俗習慣辦理，但廢除各種拷刑，並准各鄉耆老秉承英國官吏意旨管轄鄉民，仍候國主裁奪。」⁹ 儘管英國在香港實行「華洋分治」，但以英國文化為首的西方文化，仍透過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宗教、傳媒等不

-
5. 參見香港護理總督莊士敦（義律的副手，在義律離港期間任護理總督）的書信手稿，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
 6. 1841 年 4 月，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措辭嚴厲地譴責佔領「香港」的義律：「您已經割取了香港，一座幾乎了無一屋的荒島。……香港決不會成為商業中心，充其量只是第二個澳門而已。貿易會在廣州繼續進行，香港如果有什麼價值的話，不過是可供英國人建屋閒住，以替代在澳門度過貿易淡季而已。」參見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 1 卷，凱利一沃爾什公司，1910 年，第 642 頁。
 7. 在英國殖民宣傳下，「一八四二年前之香港，為一小漁村」，有關說法試圖極力美化英國將「小漁村」變成「大都會」的「功績」。
 8. 當代英國學者安德葛（G. B. Endacott）宣稱：「香港歷史的實際開端是在 1841 年英國人到來的時候。」參見安德葛：《香港史》，第 8 版，牛津大學出版社，1985 年，第 4 頁。
 9. 張月愛編：《香港與中國——歷史文獻資料匯編》，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1 年，第 164 頁。

同管道，對香港文化產生強大的輻射作用。

管治方面，英皇於 1843 年頒佈憲制性文件《英皇制誥》與《皇室訓令》，賦予英國政府及港督統治香港的權力，確定了香港政權的組織形式與運作原則。英國人沿襲英國殖民地傳統管治模式，在香港建立一套以港督為核心的行政主導管治架構，推行殖民政策。行政權和立法權並非分立，而是由港督一人總攬，「如果他願意行使其全部權力的話，他可以使自己成為一名小小的獨裁者」。¹⁰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港督甚至可以用「我不歡迎你」為理由將所謂「政治敏感人士」遞解出境。透過人事任命、立法和駐軍控制等管道，英國人壟斷了香港的管治階層。

法制方面，英國人仿效英國殖民地做法，在香港設立法院和監獄，建立警務機構，實行種族歧視，強化殖民統治。1841 年的義律文告奠定了香港二元法制體系的基石，成為清代法律在香港保留和適用的最重要法律依據。在社會與家庭領域，華人用華法，西人用西法，成為香港法制的二元特色。直至 1865 年，英國政府才修訂對香港總督的訓令，規定「任何法例若對亞非裔人士有所禁制，而歐籍人士則不受其限者，總督均不得批准施行」。

經濟方面，1841 年 6 月，港英政府正式宣佈香港為自由港。香港興辦轉口貿易，逐漸成為區內重要的轉口港。在貿易帶動下，輪船運輸業興起，近代金融業和造船業開始發展。港英政府大力扶植英資財團，在銀行、地產、公共建設等重要領域，英資財團佔據壟斷地位，控制香港經濟命脈，成為殖民統治的重要支柱。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從事進出口委託和販賣業務的南北行與金山莊崛起，成為華商的中堅力量。華人商業經濟的勃興，推動了香港資本主義的發展，亦促進了香港的城市化與近代化。

社會方面，港英政府初時實行種族隔離、分區而居的政策，頒佈《保留

10. 諾曼·邁因納斯著，伍修珊等譯：《香港的政府與政治》，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86 年，第 94 頁。

歐人區域法例》等一系列法令，以法律形式限制中國人居住區域，保障西方人利益。早期歷任港督無不推行種族歧視政策，直至第八任港督軒尼詩，在華商力量崛起的大背景下，才開始採用籠絡手法，委任傑出華商與買辦為太平紳士、立法局議員等，甚至勸誘「歸化」入籍，極力拉攏華人社會領袖。英佔早期，香港的華人圈子與洋人圈子壁壘分明，中西方文化存在巨大鴻溝。華人抗拒西方文化，依循傳統文化自發管理華人社區，而港英政府亦樂於「以華制華」，利用華人領袖維持華人社會秩序。東華醫院作為香港最早的華人慈善機構，不僅負責仲裁華人糾紛，而且於官民之間充當特殊的中介角色，曾一度是華人社會的權力中心。

教育方面，教會人士對興辦教育表現出極大熱忱，紛紛開辦教會學校以培養本地傳教士，馬禮遜英華學校、英華書院、聖保羅書院和拔萃書室等成為香港西式學校的先驅。港英政府則因應殖民教育的需要，注重英文教育，刻意培植西方文化的代理人。香港教育委員會 1902 年報告即揭示了英國辦學培養中國學生的動機：「從大英帝國的利益着眼，值得向所有願意學習英語和西方知識的中國青年提供這方面的教育……本殖民地的額外支出微不足道，而英語的傳播，對我們大英帝國友好感情的傳播，使英國在華得到的收益將會遠遠超過這筆費用。」¹¹ 在辦學模式上，採用西式教育，在教學內容上，又大量引入西方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為香港教育帶來新景象。

對於香港，英國殖民統治具有對立統一的雙重作用：由征服所造成的「破壞性作用」，消極瓦解東方傳統社會結構；由改造所帶來的「建設性作用」，則積極催生西方現代社會形態，即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¹² 一方面，殖民者通過社會與文化的「西化」滲透，移植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價值理念，試圖割裂香港與中華文化母體的聯繫。但香港在地緣政治和人口構成上的獨特

11. 參見 1902 年《香港立法局會議文件匯編》，第 8 頁。

12. 參見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68—70 頁。